

生育文化的现代化和生育控制机制的转变

穆光宗

【提要】 本文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系统地讨论了生育文化的概念、内容和变迁,认为生育文化的现代化是21世纪中国内生型生育控制机制得以形成最为重要的内驱力,而河南省新密市建立社会保障机制的实践恰好提供了一个给人启迪的案例。

【作者】 穆光宗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1. 文化视野中的生育:“生育文化”的界定及其讨论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在考察了人类文明发展史后,曾经提出:人是文化的生物,因为正是文化的塑造力使生物学意义的人进化为社会学意义的人,从而区别于一般的动物而成为万物之灵长。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塞拉教授在《文化与自我》中曾论述了文化对人类的影响,他指出:“文化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文化同自然环境一起代表着塑造人类行为模式的两种主要的‘外部’来源。这两种外部来源的影响作用又同生理与心理的两种‘内部’来源交互作用,从而构成人类行为的基本的决定因素”^①。

如果说人是文化的生物,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可以说人口是文化的产物,人口发展也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表现;甚至有什么样的文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就预示着会有什么样的人口发展。其中,有关生育的文化对人类的人口发展有着直接深刻的影响。譬如,远古时期人类人口的高生育率与今人所称的生殖崇拜文化就有着莫大的关系。赵国华先生认为,人类的文明恰恰是在生殖崇拜中诞生的;生殖崇拜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原始社会人类的主要精神文化,甚至也是上古早期的主要精神文化(赵国华,1991),而且至今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仍然隐伏着强烈的生殖崇拜精神。对生育的普遍信仰和追求早已成为中国人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生育成了无须言说的人生使命。

生殖崇拜观念对中国文化、中国人口的深刻影响似乎从一开始就证明了人口与文化的血脉关系。历史地看,生殖崇拜是人类先祖从弱小走向强大的变化动力。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人类总是那么弱小,生存总是那么艰难,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就在这个时候,生育的神圣和伟大被凸现出来了。女性因为生育价值的被肯定而登上历史舞台,由此也就有了母系社会。极度落后的生产力加之人力的寡薄使得人类先祖的生存环境显得格格外恶劣,人类“种的蕃衍”时刻面临挑战,婴儿存活率极低,而成人的平均寿命大概只有30岁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生存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就变成了生殖的竞争。

^① 马塞拉:《文化与自我》,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91页。

广义的文化是无所不包的。梁漱溟先生说过：“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俗常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义的。……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①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涵盖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狭义的文化主要指一个民族的观念形态。在中国古代，“文化”意为“以文教化”。《易·系辞下传》释“文”为“物相杂”，指刚柔相间，有纹理；释“化”为生育。“文化”一词在西文中原出拉丁文 Culture，本意是耕种、培育，引申为知识、艺术、教育、法律、道德、情操、风尚、信仰等涵义，与中国“以文教化”的涵义接近。文化是有结构的，即表层是器物的，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中层是制度的、习俗的；底层是心理的、精神的，如价值观、信仰、思维方式。概括起来就是怎样生活、怎样做人（钱穆，1997）。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也就是人生，而人生不管是多么的丰富多彩，都不外乎这两个方面。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定义“生育文化”呢？一种观点认为，“生育文化”是指人们在生育及相关活动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规范制度，即人们在婚姻、家庭、生育、节育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知识能力、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等（吴伯义，1998）。这是一种相对宽泛的定义。另一种观点认为，“生育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人类在生育问题上的一整套观念、信仰、风俗、习惯及行为方式（李银河，1994）。这是一种相对狭义的界定。

作为观念形态存在的“生育文化”向来被人们所关注和重视。作为生育文化的核心，生育文化在精神或者说意识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生育观念和价值标准可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对生育目的和意义的认识，即生育态度；（2）对生育子女性别的价值取向，即生育偏好；（3）对生育子女数的期望，即数量预期；（4）对生育子女的质量期望，即质量预期。这样，“生育文化”就被界定为生育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形式（朱国宏，1996）。但上述“质量预期”的说法尚可讨论，一则本来意义上的“质量预期”没有实质性内容；从古至今，无论中外，大抵生育决策者潜意识或有意识地期待着优生优育。二则引申意义上的“质量预期”实际上已包括在性别偏好上了，性别偏好包含了对基于性别差异所产生的孩子质量的不同评价。

2. 生育文化的变迁、动因及其影响

传统生育观是以传统社会的生活环境为前提，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人口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传统生育文化起着根本性的导向作用。然而，当现代化的洪流涤荡着传统社会的一切，人们的生活世界在器物层面上发生巨大变迁时，我们却常常发现：传统生育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仍未绝迹，传统生育观迟迟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

在相当长时期内，传统生育文化对于人口发展和文明演进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正面的。只是到了现代，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适度的标准，整个社会开始被过剩人口问题困扰时，传统生育文化的作用才逐渐转向了负面。由此，也就提出了传统生育文化需要改造和现代化的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一夫一妻制的确立，私有财产的形成使得生育不再是两性结合的自然产物，而是关乎安身立命的第一大事，并且逐渐形成了与小农经济、私有财产及其身份继承制度相匹配的有关生育的一整套观念体系。譬如，生育为发展生产、财产继承、身份继承、宗祧继承、赡养父母所必需；为实现这一目的，只有生育男性子嗣才是十全十美的；男性后代多多益善，由于无法选择性别，便演化为为求男性后代而早生多生，即使溺弃女婴也在所不惜；这种生育的观念体系和价值标准可以概括为“多、男生育”的特点（朱国宏，1996）。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观念层面上完全具备了上述特点。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

首先,在生育的目的和意义上,中国人崇尚的是“子福”,所谓“多子多福”,“妇凭夫贵,母以子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等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以乡土社会为“生活世界”的农民,其人生的终极目的在于传宗接代和为家庭兴旺做贡献,在“家族”面前,“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换言之,中国农民的生育决策是“家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的。在生育观念上,中国农民总将自己看作是由祖宗传下来的生命之链中的一个环节,将这链环延续下去是他们此生不可推卸的责任和生活目标,是对祖先的“还债”,而生育正是保证这链代代相续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总之,生育在中国农民的生命逻辑中是一桩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人生使命,是基于村落文化、家族文化和生育文化指令的一种自觉的欲望,是一种终极意义的价值需求。

其次,在生育的性别偏好上,传统的中国人大多崇尚“有子万事足,无儿万事休”,“三千之责,莫大无后”等等。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反映了多种生育上的需求,主要的有继嗣需求,面子需求,劳动力需求以及养老需求。

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中,中国父母、家庭最初和最终的责任都是对祖先和后代尽力。例如,在江浙一带,“讨债”和“还债”这两种隐含着不同价值评判的说法就颇能说明问题。“债”不过是“欠下什么东西”的意思。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这种文化是通过评价表现出来,有道德感的中国农民无不认为“欠债不还”是十分可耻的事,所以要努力去“还债”,去完成祖宗交付的责任和义务——生儿育女,兴家旺业。

“生育”与“债”的关系有两种相辅相成的解说。一种是从直接的“生”的意义上讲,“能生”是还债,“不能生”是不还债;“生男孩”是还债,“生女孩”是不还债。不过,比较来看,对能不能生的评价更重要。一个“债”字用得很传神,也很重,透射出中国文化强烈的伦理要求和道德评价。传宗继嗣即“还债”,即续家族兴旺之梦。“祖宗崇拜”和“种子信仰”相依相伴。传宗接代、家族绵续是环环紧扣的,一旦在自己这一环脱钩,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另一种是从间接的“育”的意义上来讲的,当孩子淘气不听话时,父母会骂一句“讨债鬼”,言外之意是对不起祖宗;反之,当孩子争气听话时,做父母的也会赞扬一句:“真还债”。

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也反映了一种面子的需要。中国农民通常生活在“村落”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内。由于生活空间狭小,什么事也逃不过彼此的耳目,别人的事似乎总是自己的事,家长里短的是是非非均是洒扫应对、饭后茶余时的主要谈资。社区舆论力量强大,生活中的任何人、任何事都难以摆脱别人的评价,而在生育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生活在具有浓郁乡土特色的“生活世界”中,世代以农耕为主,而土地这种资源是很难流动的,这注定了传统农民的流动率很低。这样,由于日趋增长的人口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的世代堆积,加之长期以来乡土社会其他的发展机会极小,“个人的成就空间”就显得比较拥挤,所以生育对于中国农民人生价值的肯定或者否定意义就非同一般。能不能生、能否生男孩以及能生多少等生育问题成了特定社会结构中对农民个人成就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穆光宗、陈俊杰,1996)。

再次,在生育子女数的期望上,传统的观念是崇尚“多子多福”。人们对此的解说早已不厌其详,举不胜举。简单来讲,之所以追求“多生”有以下一些原因:

其一,“多生”有助于降低子女及其父母的生存风险。一方面,多生多育就不怕孩子成长过程中死亡因素对成活率的影响,高出生率与高婴儿死亡率的呼应使得微观的人口增殖建立了一种平衡机制;另一方面,多生多育也使做父母的多了几分今后的依靠。在重视亲子关系的传统社会里,在生存资源十分紧缺的条件下,孩子就成了父母降低自身生存风险、增强家庭在安全和经济上的保障力度最可靠、也最重要的“资源”。

其二,在传统社会,人力直接表现为生产力、震慑力和战斗力。人力投资上的经济价值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育上的投资在经济上大抵是合算的:一方面,抚养成本很低,多养一个孩子,不过是锅里多放一瓢水而已;另一方面,预期效用则多且大,从面子到人力,再到养老,方方面面都能得到满足和支持。

追求多生,实际上也是基于“人多势众”的事实而产生的一种势力上的需求。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人治社会,而且越是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人力就越是重要。自古以来,能够横行乡里、雄霸一方的往往是人口多(尤其是弟兄多)、势力大的家庭或家族。这种来自生存的压力必然会落实到生育竞争上。“人力”在解决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可以表现为一种震慑力和战斗力。而生育则是拥有这些势力的基本途径。

其三,在生育方式的选择上,“早”和“密”是传统的特点。在传统的农耕社会,早婚早育的好处,一是符合文化的规范,“早生贵子、人丁兴旺”是人们由衷的期待和祝福。二是可以有效缩短劳动力再生产周期,顺利完成代际的交替。此外,在客观上,早育、密育与人们不懂避孕节育的知识、缺乏节制生育的强烈愿望以及必要的手段有关。历史地看,无节制的、自然型的生育状况大致都会在生育方式上表现出上述两个特点。

文化变迁滞后的事实和理论一再提醒我们:生育文化的现代化将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对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变迁,持肯定者居多;但什么时候开始了变迁,这种变迁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等问题,迄今为止的研究还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充分圆满的答案。

有学者认为,生育文化包括三个方面,即生育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形式;因此,区分生育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亦应从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来判别。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从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发生转变,而且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理由是,传统生育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形式已经发生变化。一是私有制被改造成为公有制,同时农村经济走向集体化的道路,昔日的一家一户为耕作单位的小农经济转变成了公社制下的集体经济。二是家族制度和宗法组织也在新中国成立后遭到了打击和取缔(朱国宏,1996)。

这虽然是事实,但由此产生的对生育文化转变的正面影响可能是被高估了。1957年对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超越学术范围的非理性批判,与国情相悖的“人手论”的登上历史舞台,“人口不断增长”被视为“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舆论导向,巩固和维系了传统生育文化的“市场”,转变的迹象只有在部分城市人口中才能观察得到。譬如,50年代初,一些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城市职业女性和知识女性已在无可奈何的“角色冲突”中感受到了“多生多育”的羁绊,从而产生了节育的想法和要求。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积极支持了群众的要求,他指示卫生部放宽对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的限制,放宽对进口避孕药具的限制。这是中国政府提倡计划生育的开端,也是传统生育文化开始转变的端倪。但总体来看,传统生育文化的生存基础和维系方式恐怕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改造。

在理论上,笔者认为,生育文化的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并不存在截然分明、一线相隔的界限。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生育文化的转变大致会经历传统型、过渡型、现代型和后现代型几个阶段。传统型已如前述;过渡型则是传统影响渐弱、现代影响渐强,但两种影响又互相交杂、有时难定高下的一种类型或阶段;现代型大致可概括为:“晚婚晚育、少生优育”;而后现代型最突出的表现或许是有婚不育和非婚生育,而在生育的数量和质量的追求上,也大抵不出“少生”和“优生”的范畴。

生育文化的转变肯定是一个缓慢、逐步的过程,是从“边缘的转变”过渡到“内核的转变”,或者说从“基础的转变”过渡到“根本的转变”的过程。边缘的、基础的转变是指生育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改造,内核的、根本的转变则是指生育文化观念和价值层面的变化。从新中国

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种种事实来推论,大致可以认为:中国生育文化的转型正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比较初级、变化缓慢的过渡阶段。

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生育文化的变迁呢?现在看来,否认生育文化的转变是无视历史事实的,而肯定生育文化的转变已经完成恐怕也过于乐观。

笔者的看法是,转变中的生育文化是一波三折的,总的方向是自传统而现代的。目前,生育文化的转变已从初期进入后期阶段,但现代生育文化还不能说已彻底形成。8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升高、偏高现象背后所反映出的强烈的歧视性性别偏好,说明生育文化的转变已碰上最难触动的那个“内核”。

历史地看,大致可对新中国成立后生育文化的转变分为:(1)1949~1957年为转变初期阶段,在城市,节制生育渐成风潮,甚至影响了当时政务院的决策。(2)1957~1973年以“新人口论”被打入冷宫始到开展全国性的计划生育终,这一阶段复杂有加,难以一语道破,似可称为转变中断、文化复古和转变重续交互影响的阶段。(3)1973~1980年以计划生育开始被倡导始,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内容的公开信出台终,由于外部性诱导(社会性生育控制的作用)和自愿节制生育这种内在需求的契合,生育文化转变进入了方向明确、步伐加快的阶段。(4)1980年以后,生育文化转变进入了耗时最久,也最为艰难的阶段。尤其表现在性别偏好问题上,社会性计划生育的具体要求与传统生育文化的内在规范构成了尖锐的和持久的冲突。

概括来看,观念层面上的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在生育偏好选择上的主要特征可以说是:“生男、早生和多生”,而生育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首先表现在生育数量偏好选择的变化上,其次是生育时间偏好选择的变化,最后才是生育性别偏好选择的变化。也是传统生育文化的内核所在,是最难触动的。

现实地看,当今中国大多数农民的生育决策模式属于“生男、早生”型。许多调查证明,超过半数甚至更高比例的农户其生育的数量偏好是两个左右;从性别构成看,大多期望“儿女双全”的理想结构,而只要1个、放弃生育或者要3个及以上的均为少数。新近的研究证明:农村经济变革所带来的连锁反映已经引起了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许多变化,以浙江省部分农村为例,随着妇女地位,特别是年轻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人们对男孩的偏好有所淡化,开始认识到在农村的生产、生活和家庭养老中,女孩也同男孩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对中国经济较发达的东部省份(如江苏、浙江等省)有关农民生育需求的调查却发现:在现实生活对生育的需求发生变化的同时,人们精神生活对生育的需求并没有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生男孩仍然是农民精神上的最大满足,这被解释为近年来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由此推断,中国农民离“少生、晚生、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现代生育模式还有相当的距离(解振明,1997)。

中国人众地广,幅员辽阔,但各地之间的差异很大。在生育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一般要相对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产生于中原一带的传统生育文化,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中国东部地区的影响。综合来看,现今观察到的生育文化定位在特定的历史坐标上,那么它就既不是纯粹的传统生育文化,也不是典型的现代生育文化,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转变中的过渡型生育文化。比较来看,如果说东部地区的现代性更强,那么中西部地区则传统性更为明显。在这种文化的育成中,既有现代性因素日趋显著的影响,也有传统性因素根深蒂固的作用。

3. 创建新型的生育文化:对河南省新密市的考察

新型生育文化是一种告别传统、迈向现代的生育文化。从内涵来讲,新型生育文化在国家

计生委宣教司看来,大致包括三层意思:(1)晚婚晚育,少生优生;(2)男女平等,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3)男性参与,计划生育,丈夫有责。

通过对河南省新密市的考察,我们对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特点有了清晰的认识,即政府领导,集体投入,群众参考,通过“利益补偿”、“利益共享”机制奠定计划生育更上一层楼的群众基础,使计划生育真正成为广受欢迎、文明进步的事业,从而推动新型生育文化的育成。其突出的特点有二:一是“自上而下”,新型生育文化的创建既离不开政府行为,也离不开非政府行为;是一种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由政府组织策划、群众广泛参与的建设性活动。二是“利益共享”,通过提供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实现“利益共享”的社会目标,并通过这种机制将公众行为整合进社会进步的目标框架中去。

建设新型生育文化的初步构想大概形成于1997年5月。在一次全国性的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会议上,为了适应国家计生委“两个转变”的要求,提出“深化宣传的意见”,旨在提高妇女地位,巩固低生育率成就。半年之后,国家计生委在苏南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依托社区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工作思路,随后进一步细化的提法是:“依托社区,面向家庭,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结合新密市的实践,更明确的提法可概括为:“依托社区发展,服务面向家庭,建设新型的生育文化”。

新密市是国家计生委宣教司“生育文化试点”40个网络县之一。从实际情况看,在新密市开展“生育文化试点工作”不仅顺应了时势,而且结合了市情。经过多年的努力,到90年代初新密市接近实现了低生育率的目标。1995年,粗出生率已降到14.31‰,自然增长率降至8.40‰,计划生育率保持在92.76%,综合节育率达到90.28%。特别是90年代中叶以后,少生少育现象越来越多。

新密市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不能再走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就人口抓人口,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的老路,而是要通过计划生育社区社会保障,努力解除计划生育户的后顾之忧,从而达到促进生育观念的转变,形成新型生育文化,巩固初露端倪的低生育率格局的目的。具体做法就是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转变机制,由社会制约为主,转到社会制约和社会保障相结合。二是转变方法,由过去主要依靠计生部门来抓,转向综合治理。三是转变观念,从一般的宣传教育,转到构建新型生育文化。

在为计划生育户提供社会保障方面,新密市生育文化建设第一个试点村黄固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村把原来对计生户、独生子女户、双女绝育户的社会服务和优惠政策深化为社会保障制度,固定下来,使独生子女户、双女绝育户在子女入托、入学、医疗保健、就业、养老、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截止1998年6月,黄固寺投入16800元,为全村23户独生子女户和5户双女绝育户全部投了保。同时还规定,进敬老院的60岁以上老人的生活费由养老保险金支付,不足部分村为双女结扎户补助50%,独生子女户由村全部承担,从根本上解决了村民老无所养的后顾之忧。此外,目前,在10个村办企业中工作的350名村民,80%为独生子女户。计生户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惠、生活上有保障都成了现实。

对计划生育户提供的多方面优惠和服务已经在村民中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个案一:独女户代表蒋某在村服装厂上班,有一个女孩,认为以后无人养老,想再生一个,自从村里制定社会保障制度以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理由是:作为独生子女户,其女儿上学不用交学杂费、书费,若考上大学,可获奖励现金1000元,送电影一场;每月还可以领到独生子女保健费;免费发种子、化肥,免费喷灌;到农忙时,收、割、种、耕、打农药采取机械化保本服务;村里还给他们夫妇入了养老保险,给其女儿入了人身保险,在村、乡、县医疗单位就诊报销比其

他非独生子女户高5%的医药费,解除了后顾之忧。照顾独生子女户的优惠措施在这个家庭产生了较理想的社会效果。但这个个案反映的信息是有限的。一则,蒋某并非没有再生一孩的想法,只是社会保障的做法使其产生了似无“后顾之忧”的念头,这种念头是否最终能内化为一种心灵的力量,一种意志的表达,还不好说;二则,所谓观念的转变其实直接同保障制度的实施有关,现在社会保障涉面虽广,但从发展的眼光看,保障水平、保障力度还不够。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依托,旧的生育观念极可能出现回归的现象。所以,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继续发展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使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能得以维系,并且能不断健全起来。

个案二:双女户代表程某把享受的各种待遇算了笔账:从1990年算起至子女18周岁,享受各种保障折款共35700元,和有儿有女的家庭相比,将节省71400元的开支。所以其妻在小女儿刚满月时就去做了结扎手术。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生育决策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比较利益的预期。只有我们时刻关注和保护计划生育户的利益,重男轻女的观念是可能被消除的。前提归根结蒂只有一条:就是生育利益因计划生育造成的预期损失能够通过制度化的保障形式在非生育利益方面给予令人满意的补偿和替代。

个案三:村民李某有两个孩子,但不是非计划生育户。他所受到的触动是:他周围的独生子女户,双女结扎户得到了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所给予的好处,在许多方面,都享有优先权。他很羡慕别人享受的那些优惠条件。可见,对独生子女户特别倾斜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已经在非独生子女户中产生了羡慕“少生优生”的社会心理。

生育投资所预期的回报除了“面子”和“情感”的需求可以马上实现外,在经济收益方面一般都要经过一段时期。而中国农民的一大特点是务实,在生活水平不算高的初级阶段,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发家致富成为时尚的今天,多生育已渐失市场;经济理性的增强,社会变迁的事实也使农民慢慢认识到儿女并不一定真的可以依靠。

从理论上分析,我们可以用“贡献一回报”的架构来说明倾向于计划生育户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成功。过去,我们宣传中唱高调的居多,为国家、社会自然没错,集体主义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不能丢弃的传统,但生育毕竟直接关联着计划生育户的切身利益,所以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若全然无视计划生育的生育损失,不仅于情理不合,而且事实上也是事倍功半、欲速不达的。强调运用的利益导向机制,引导群众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决定,显然比单纯依靠强迫命令和行政措施要高明得多。这是中国计划生育事业在90年代的一大进步。

事实证明,转移计划生育户的兴奋点,使之角色多元化,并放大其成就空间,增大生育的机会成本,对于转变生育观念颇有助益。例如,新密市曲梁乡大樊庄村,抓住市场经济的机遇,引导农民发展服装加工,积极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大大激发了农民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全村几百户农家办起了服装加工厂,很快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专业村、亿元村。问及一些青年夫妇不要生育指标,不生孩子的原因。他们的回答是:“忙着挣钱发家,哪有功夫生孩儿?”可见,生育机会成本的悄然放大使晚婚晚育的观念渐渐有了“市场”。

饶有趣味的是,独生子女户、计划生育户在脱贫致富的竞赛中,比多子女户显出了优势。从大樊庄“少生快富”的实践来看,由于独生子女负担小,精力充沛,相对优势明显,表现在结果上是人均收入与多子女户逐渐拉开了距离。由于不少计划生育户的兴奋点已转移至脱贫致富、富而思进上,少生优生的选择也就渐渐地成了时尚。

特别发人深思的是,妇女的解放和参与社会发展对新型生育观念的形成影响巨大。妇女作为生育的具体承担者,一旦其地位和角色发生了质的变化,譬如,从过去的依附男性到现在的独立自主,从过去的家庭妇女到现在的职业女性,其生育观念及其生育决策也会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

跨越,主动退生育指标、选择晚婚晚育的大有人在。据统计,大樊庄自动推迟结婚、生育的有 160 多人。仅从大樊庄乡“三结合”的实践就已证明,“利益导向”、“利益共享”才是治标又治本的良策。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个人的发展的确是诱催现代人口转变的“看不见的巨手”。从过去主要依靠“政策”,到现在主要依靠“发展”来达到生育率转变和巩固的目标,这是历史的进步!

一般而言,精神文明建设对于促进观念的变革和文化的变迁有重大作用,黄固寺村在运用社会心理的良性暗示和激励方面,成效显著。特别在促进妇女解放、自我觉醒、参与社会方面,可谓煞费苦心。譬如,几年来村里利用“春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组织妇女秧歌比赛、拔河比赛等娱乐活动,丰富了广大妇女的精神生活,使广大妇女离开锅台,走出小家庭,走向社会,促进了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村年终评一次“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女能手”等,照片贴上巾帼榜,被评上的妇女扬眉吐气,没评上的也暗下决心,争取下一年榜上有名。此外,通过生育文化室进行优生优育、节育避孕、生殖健康知识和致富技术的教育,抓住少生快富的典型事例进行教育,将育龄人群从管理对象变为服务对象,使他们成为计划生育的主人。几年来,全村 2 207 人,463 名已婚育龄妇女无早婚、早育、计划外出生现象,全村呈现出“比学赶帮”,看谁致富快的良好氛围。

从总体来看,开展计划生育社区社会保障,的确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这种欢迎是观念转变的一个契机。据 1999 年新密市人口委员会对开展“生育文化试点工作”6 个村的调查,总满意率高达 98%(调查人数 748 人,总人口 16 407 人),但由于样本不大,而且可能是非随机的,所以代表性会打折扣。其中,黄固寺村、下五村、五里店村均达到 100%的满意度,石匠窑村、平陌村、大樊庄村则分别为 96%、95%和 98%。被调查村村民的生育率接近甚至低于“政策生育率”,生育观念有了较明显的转变,新型生育文化初露端倪。这是中原地区进入内生性生育控制新阶段的一个信号。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是基础,利益导向是方向,优质服务是措施,行政制约是辅助”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新模式,进而实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生育观念的初始转变并不等于宣告了一种新文化的诞生。文化的内核是约定俗成的规范和习惯,没有几代人的濡染和涵化,文化是扎不下根的。新型生育文化的育成绝对是有条件的,而且这样的条件又绝对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参 考 文 献

1. 马塞拉:《文化与自我》,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 年。
2.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年。
4. 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载于傅建成编:《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 年。
5. 高令印:《中国文化纲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6. 傅道彬:《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7. 吴伯义:《建设社区社会主义生育文化》,《人口与计划生育》,1998 年第 4 期。
8. 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
9. 朱国宏:《生育文化与人口控制》,载于彭希哲、戴星翼主编:《中国农村社区生育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
10. 穆光宗、陈俊杰:《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人口研究》,1996 年第 2 期。
11. 张国洪:《吴地传统生育观描述——吴地传统人口思想的民俗学考察》,《学术月刊》,1997 年第 8 期。
12. 解振明:《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变化》,《人口研究》,1997 年第 2 期。

(本文责任编辑: 朱 犁)